

國父全集外二篇重要演講佚文

吳相湘

國父一生六十年中，大半的時間消耗在海外，即在國內也很少在一地定居三四年，加以民國十一年六月陳炯明叛變，砲轟廣州觀音山，將國父的書籍及手撰文稿都燬去。因此，國父生平有關文獻的收集迄今是一「仍須努力」的工作。

胡漢民、甘乃光、黃季陸諸先生先後編輯「全書」，在這方面有重要貢獻。其後中央宣傳部與中央黨史會又刊行「全集」，都是以「全書」為基礎，再陸續增添新得資料。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國父百年誕辰時刊行的「全集」三巨冊，是最近的版本，但內容仍不完備。最應該指出的缺點即始終沒有注意收集國父在海外的文獻，尤其是英文資料。例如民國十年八月二十八日國父寄蘇俄外交部長齊采林英文函是一重要文獻。國父全集未刊載譯文，國父年譜增訂本列有是年六月十四日接蘇俄外長來函。而八月記事中却未有國父寄信的綱目，更不必說內容。其他英文資料近年出現殊多，也都未見搜羅刊佈。

孫先生不僅是中華民國國父，更是世界偉人、二十世紀五大傑（甘地、凱末爾、列寧、威爾遜）中的先進，而其半生在海外，其「全集」中應有英文文獻自是天經地義。如為便利國人閱讀，刊載譯文尤有必要，事實上，「全集」中

刊載一九〇四年在美國發表的「中國問題的眞解決」即是譯文，百年誕辰會刊「全集」本與國防研究院刊「國父全書」中同一題旨譯文即有出入歧異。

「中國問題的眞解決」一文，「國父年譜」指陳是國父第一次發表的對外宣言。事實上：早在一八九七年三月倫敦「半月評論」就刊有國父手撰「中國之現在與未來」。國父在這一文章中指出發展自然富源，並且必須「復興中國的文化，而當前由於清廷千方百計地錮蔽，文化已為民家所完全不能與聞了」。這些主張很快引起世人注意，是年聖彼得堡出版的「俄羅斯的財富」雜誌第五期就刊載譯文。這比較「中國問題的眞解決」所發生的影響要大。故如論「第一次」應以是文當之符合事實。

一九六六年莫斯科為紀念孫先生百年誕辰，曾刊行孫先生有關文獻目錄一冊，其中包含臺北出版所有關係資料。而我們對於近二十年來俄人發表的孫先生文獻却迄今沒有注意收集！

胡漢民黃季陸先生等收集國父文獻時，是以國內報紙雜誌書刊作憑藉。當時國內各圖書報（上海鴻英圖書館例外）幾乎完全沒有收藏現代資料，同時也沒有做索引工作，搜檢是很艱難的

。但近二十年來各國都注意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史，努力搜集資料，各種報紙雜誌先後被購藏，且被攝製成顯微影片，如上海時報、申報、天津大公報等均可向日本美國購得正片，並有較詳目錄。祇可惜我們在國父百年誕辰前竟沒有注意向海外搜求編成一較完備的全集作為獻禮。例如革命與保皇之論爭，保皇派在新加坡刊行的「總滙報」，筆者在倫敦大英博物院及新加坡大學均曾見到。且有一陳女士英文著述。但國內近刊著述迄未知引用。

筆者非常幸運，近十年來竟獲見許多「全集」「年譜」以外的重要史料。例如民國四十八年在倫敦檔案局首先得閱國父蒙難檔案。五十年在日本外務省新廈得見一八九七年至一九〇〇年有關孫先生在日本活動的檔案，這些檔案在一九四九——五一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在東京攝製顯微影片時沒有被發現，故膠片目錄上註明「遺失」。這是日本復員初期檔案未克完全清理插架所致，等到日本外務省震閣新廈落成原註「遺失」的檔案因從頭徹底整理才被發現。更有趣的是：一九〇〇年我留日學生刊行的「譯書彙編」，馮自由尊之為「留學生界雜誌之元祖」，也是介紹孟德斯鳩盧騷自由平等學說的最早中文刊物。中央

黨史會未有藏本，就大陸近刊有關目錄看來也無其最早刊本。但筆者竟很輕易地只化新臺幣五元在臺北市牯嶺街舊書地攤上買到其第二期一冊，然後根據日本書目向京都大學及早稻田大學攝得其書第一期及第七第八期。今已彙印成一冊了。至於革命黨在新加坡刊行的中興日報也是筆者於一九六二年購到顯微影片帶回臺北，更是此間史料庫意想之外的。本文所引錄的是一九五九年六月筆者第一次遊美在舊金山唐人街一中國文玩店地下室尋到廉價購得。這冊書名正中印「演說學」三字，右上側印双行「岡野英太郎博士著」「孫中山先生演說詞」。左側印「上海國光書局印行」。版權頁印有「民國十五年六月再版」、「定價大洋五角」字樣。

經過詳細比較國父全集內容，並研究有關資料以後，筆者願鄭重指陳：這三篇不見於國父全集的重要演講文實具有極高史料價值。

今先將這二篇重要演講文分別抄錄於左，（原書未分段，今便利讀者特為分段）再加闡釋。

孫大總統對學界大演講

（在省教育會召集學界舉行宣傳大演講）

孫大總統在省教育會，召集廣州市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學生舉行宣傳大演講，到會者千餘人，中多莘莘學子，於秩序極為整肅，令人起敬。二時搖

鈴開會，先由汪會長宣布開會理由：略謂第五次全國教育聯合會改正教育宗旨為養成健全人格，發揮共和精神；故現在教育家欲達教育宗旨發揮共和精神，不可不于教育設施上有所研究。今日幸孫先生到本會演說，使廣州市教育界人員得親聽手造共和之人，演講關於教育事項，實無上之盛會，想各位今日定必以研究的態度，領受孫先生之演講也。說畢，即介紹孫先生登壇講演：

列位教員學生：今日兄弟到此與各位談話。有二件事情：頭一件以後學生交際宜定一個普通稱謂，造成一種風氣，使人人做效。查各國社會上之普通稱呼，有一專用語。此語在英文為，我國文言上無相當之繙譯，有謂可以用「各位」「諸君」等語譯之；兄弟以為仍均未妥，再四思之祇有「夥計」俗語可以譯之。但「夥計」二字為廣東下流人所最通用，學生用之似太不雅馴。不知今日為民國時代，無分上下一切平等，此俗語既然譯得妥適，則學生不妨取用，願以後彼此相稱皆用「夥計」。（鼓掌）。此一語不惟有平等之意義，兼有親切意義，用此稱謂，不特可以表示平等，且足以表示同胞真義。故兄弟以為此

後諸君稱呼，無愈于援用此語。

第二件、今日學生求學問即是求知識。衆「夥計」既然是求知識，所以今日兄弟欲與衆「夥計」說說求學。求學有二種人：（一）無意識之人、（二）有意識之人。試問座中衆「夥計」幾多為有意識？幾多為無意識？兄弟以為仍多是未定志向人！對於人生前途國家觀念世界責任多未打算清楚！但兄弟以為衆「夥計」入學堂研究學問，有師長為之指導，乃一最好機會。因社會上與衆「夥計」同年齡之人不得入學者尚百數十倍也。所處地位既優于衆人，當然于國家比衆人多負幾倍義務，所以在今日求學時期，衆「夥計」宜先立志！否則十年窗下任你讀書幾許卷，終亦無補于國家，祇一書箱而已。或謂立志為何？兄弟對於此反問，以為第一、學生須要明白中國地位。第二、學生須要認定自己責任。能了解于斯二者，然後可與言立志。衆「夥計」要記得現在中華民國。五十年前是一東方未開化之國家。更要知到現世界一等強國之日本，亦是五十年前在東方一野蠻之國家，但當時日本有二志士，一為大隈重信，一為井上馨，此二人做學生時已深明國家地位，覺得國家不唯主權已被侵蝕，即數千年來之閉關主義亦將次

為列強威力所攻破，忸隍之象，甚于蒙卵，心中忽生責任來，以為非求新知於世界，斷不足以救國，於是立志出洋求學以為救國準備。無如當時日本禁人出洋，故彼二人志雖如此，終不得達，後來幾經艱難，得一機會始走出洋作苦學生，卒之學成歸國，將國家改絃更張，使舊染汚俗咸與維新，不數十年間，國勢蒸蒸日上，直至今日竟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今日眾『夥計』為學生求學之機會遠勝于日本大隈井上二人，今日中國文化程度又遠出日本五十年前之上，實在大有可為。故兄弟以為眾『夥計』對於民國宜生一種覺悟，見一種責任，知到日本當時國勢如此弱小，彼大隈井上二人尚能救回日本，使轉貧為富轉弱為強，況中國地廣人眾大於日本十數倍，富國強兵必非難事，大眾發奮為雄，立志救國，已立此志者，務求此志之實行，未立此志者，改從今日誓立此志，以圖救國家之危亡。抑有進者，現在中華民國官僚腐敗軍閥橫行，不成國家，眾『夥計』立志則有希望，不立志則無希望；簡直可說中華民國之存亡呼吸繫於眾『夥計』立志救國之一念（眾鼓掌）。

救國從何而起？此無論誰人皆知自改良政治入手。但改良政治又從何而起？兄

弟以為此當先知國民由何種主義孕育而來，誠以其所由孕育之主義不明，即無從負責及不知趨向也。然孕育國民主義為何？即三民主義是。三民主義為何？即民族民權民生三要素是。但又有謂三民主義為民治民享民有者，其實此不過用語不同，其為用則一而已。茲依次說明俾眾『夥計』對於民國知所負責知所趨尚焉。

中國革命志士犧牲頭顱財產，以求推倒滿清政府，此是民族主義所使然，但革命十年中國仍無可以大慰民志者，此因由三民主義未發達，亦由民族主義不澈底之故。革命初步，提倡民族主義最力，當時漢人被鞭鞭人征服，政治上處於不平等地位，自然多人明白，易於入心，故信賴者多而且篤。迨此主義成功，推倒滿清之後，充入假革命黨人極夥，爭權奪利，黨心任途，於時真革命黨人灰心，假革命黨人愈熾，愈弄愈壞，是以語其政治比不到滿清之專制。此後大家需要覺悟，要負責爭回政權，實行改良國政，使國家日臻強大，日臻盛治。更要明白推倒滿清不過是消極的民族主義，若積極的民族主義還要整頓教育，培養四萬萬同胞皆有人格的資格。更要整理國家使五族共和之政府得於列強中有一相當的地位。兄弟計算全球不過十一

萬萬人，而中國佔其三分之一，彼白人人數不過與中國等，而世界強國之中白人佔其四五，若中國能得善人切實整頓，縱不能如白人優勝，亦斷不難使國家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也。能如此，則民族主義目的始達，眾『夥計』必須要抱此積極民族主義做人，有凌辱我同胞、蔑視我國權者、以推倒滿清之手段排之，固不論其為某國抑或任何國也（眾鼓掌）。

有謂歐洲各國今日已感倡世界主義，而排斥國家主義；若我猶說民族主義，豈不逆世界潮流而自示固閉！不知世界主義，我中國實不適用！因中國積弱，主權喪失已久，宜先求富強，使世界各強國皆不敢輕視中國，賤待漢族，方配提倡此主義，否則漢族神明裔胄之資格，必隨世界主義埋沒以去。故然為中國計眾『夥計』宜急起直追，先求中國能自立，換一句話即中國人宜先求脫去奴隸地位。何以言之？中國「五七」之約，其廿一條款所載，幾乎國家盡歸其掌握。又近日關餘交涉，不惟力爭不來，其甚者從前以分得之款，亦受公使團所支配。中國明明是漢人所，尚要容人置喙；關餘明明是我國之財，尚須聽公使團之命令，此顯係民族主義未達目的所致。故兄弟既說中國欲倡世界

主義，必先恢復主權與列強平等。欲求與列強平等，又不可不先整頓內治，所以乘「夥計」今日要行積極民族主義，更要如日本之大隈井上之兩位苦志學生，方能有用，方能為中國主人，方能去提倡世界主義（衆鼓掌）。

次為民權主義在十九世紀時最盛行，我國推倒滿清以後，國家亦為人民公有，乃民國成立十年於茲，而人民尚不知行使民權之法，故有識之士咸認今日為不可不講求民權主義，以鼓舞人民。溯民權來歷，其初則奉一二有能力有見識者主持國政，及後人民知識發達，漸有覺悟，知聰明才力彼此皆不相下，遂要求參與政事，迨至今日民權發達，臻於極點，更實行直接民主制，全世界均受其影響。雖昔日閉關主義之東亞人民，亦靡不受其刺激焉。有謂民權發達，人民將何以治國家？不知此亦不難，組織機關以行使治法，斯則易易。兄弟做學生時代，早已覺中國政府腐敗，想出一種治國家之法，思有以替代之，其法維何？即五權憲法是也。其後反覆研究，均覺於中國無不合之點，較之列國更無不大對之處，是以革命之初，極力主張用此種五權憲法，以為治國之具。但當時秉政諸同志以為五權憲法各國所無，表示反

對，其結果祇成得今日約法，而五權憲法遂歸於不用。（五權憲法演詞與各報所載同茲從畧）。現在民權發達之國家，其最要件為立憲，立憲則人民有權參政，政府受其限制。查民權最發達最完全者則為瑞士國，其人民對行政且有選舉權罷免權，前者所以舉賢才，後者可以救濟誤選，又對立法方面有創制權複決權，創制複決以補法律所未備，複決權所以矯法律之不善，瑞士人民完全有此四權，是真謂之民權發達。

不獨瑞士唯然，即美國亦已有十餘州如瑞士一般。乘「夥計」之談民權，必須視瑞士，其與瑞士有同一的具體民權，方能謂之真民權，不能空空洞洞說過。從前師長對於學生每誡其不可干預政治，此乃專制遺毒，殊不足怪，甚者由歐美回國亦謂不談政治，不知 Politics 一字成二義：（一）家庭是非之謂。（二）國政之謂。此外如黨爭亦謂之。一知半解之士見歐美人有說不談政治之語，亦謂不談政治；豈不誤甚！蓋歐美人國家觀念甚重，政治趣味甚厚，所不談者黨爭與是非而已，斷非絕口不談政治者也。惟乘「夥計」見老師輩如此說，新人物亦如此說，必有妄從不談政治之一語者，不知今日中國主權在民

，謀國既以武力相迫，公使團又擅自處分關稅，蹂躪我國主權，國家地位危險殊甚，大眾要立個決心，將主權負起方能圖強。吾見今日之有學士博士銜者，祇汲汲于一二百金之薪水，鮮有如日本大隈井上其人！動以不談政治為榮，又何怪內地學生亦以不談政治為貴，此實不知責任之極。誠以若輩且不談政治，尚望何人談之？故今日兄弟以為學生均宜立志爭回政權，實行改良政治。昔日日本不過得一二留學生抄襲德國憲法幾條，竟將國家救起，我中國單就留學外國者言之，亦年以萬計，苟大眾一心，留心國政，伸張民權，則國家前途必日益膨脹矣。

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此主義從何發生？兄弟以為自機器發明始，因未有機器以前，經濟上之競爭祇人與力角勝，而人之才能又各本長短之別，是以雖欲提倡其道無自由。有機器而經濟上之競爭一唯機器是賴，同一機器無優劣之可言，若有提倡，人必樂為附和，況機器與人力較，其能率大於人者或相十百或相千萬，有機器則經濟上之競爭優勝，而富者愈富，無機器則經濟上之競爭劣敗，而貧者愈貧，迨至人民貧富相差懸殊，而社會主義遂應勢而起，況歐美社會與我國異，人民祇有貧

者富者二種，無中產階級，是以常起勞資競爭，惟有社會主義足以調和之，故此主義歐美先我國而起。社會主義有集產主義與國家主義兩種：國家社會主義者，國家各種大事業由政府借債經營，如農田水利鐵道電氣及其他可專利的事業概收歸為國營。又如土地增價，地主不費勞力而坐享其利，政府為主持公平計，亦定有二種辦法，先令地主呈報地價，或則按價而抽稅，或則照價而收買其地。以上兩種問題解決，則大利歸之國家，政府即以其所獲之利還諸人民，作諸種公益慈善事業，以調劑社會之苦樂。此主義事簡而効大，實有可行之理由。查歐美各國有煤油鋼鐵棉花麵包等大王出現，社會上常起勞資的競爭，其競爭方法辣而且毒，如美國之煤油大王其與小商競爭，先將貨物折本跌價不能爭勝，則將煤油送與人用，迨摧殘小商，始逐漸而收價而起價。又棉花大王當棉花豐收，則燒燬社會所需要之餘額，而令其價高昂。此則社會主義不行，而私有財產制發達之過。是以歐美雖文明，而人民尚多數未享文明之幸福，此俄國新文化運動所以勃興也。

俄國社會革命成功，已成為農工兵國，其革命次序由民族而政治、由政治而社

會，每經一次之改革，必受一次之痛苦，此人所共知。中國宜以俄為鑒！早日於土地資本二者加意經營，使革命頻仍之痛苦消滅於無形。且俄國革命逐漸而來，中國不然。三民主義一齊積壓而來，故與其放任隱忍而滋將來之紛擾，尚若大行改革澈底解決，以為一勞永逸之計。顧一次澈底解決三問題，其責任固在政府，亦在人民，更在衆『夥計』肩上！因國之主權在民，而士又為庶民之首，是以衆『夥計』宜急起研究設法推行，若猶以不言政治相諉，竊恐社會主義之橫決，一發而不可救，故將來國家因改革頻仍，戕伐過甚，淪於萬劫不復之地位，其責實在『夥計』。因民生主義昌明，人民衣食得所，成為莊嚴璀璨世界第一之國家，其責任仍在衆『夥計』也。

「演說學」刊載上錄演詞沒有註明年月日。

但標題用「孫大總統對學界大演講」，知其應在民國十年五月以後。而篇首按語有「第五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云云，檢丁致聘編「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民國十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七日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廣州開第七次會的記載。最初錯覺以為兩項記載「第五次」「第七次」歧異，可能兩者必有一是誤字。但再檢「七十年來教育記事」民國八年十月十日至二十五日，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山西省城開第五屆年會，議決案

二十八件，首列「請廢止教育宗旨宣佈教育本義」。這與前錄按語所云「改正教育宗旨為養成健全人格發揮共和精神」實相符節。因所謂「請廢止」「改正」均指袁世凱當政時所宣佈的教育宗旨。因此可證這一「演說錄」內容的正確性，並且推定孫先生這一演講似在十一月中旬即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廣州集會以後之假設不能成立。因為：孫先生在是年十月十五日即離穗出巡廣西。翌年（民國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始回廣州小駐，五月六日，自穗去韶，六月一日返穗，不半月陳炯明叛變發生。故按此日程，這一演說之發表時日應在民國十月十五日以前，是年八月間可能性尤多。因「演說學」另載教育會汪會長演詞一再強調：陳省長（炯明）注意教育的積極態度，時勢正相符合。且汪演詞發表於就職之初，且開始即有「前一個月當選會長」等語。而陳獨秀於是年一月應陳炯明邀至廣州主持「廣東教育委員會」，七月離職赴上海就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陳去汪繼時間正相符合。

民國十年六月（國父年譜未能確定時日），國父在廣州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述「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國父年譜」指出這是國父自民國元年以後「至是始再正式發表實行三民主義之主張」。而上錄演講以廣州市中等以上學校教職員學生為對象，實在更是孫先生公開對教育界詳細講說三民主義的首一紀錄，意義更不平凡。開宗明義提出「夥計」稱呼，可惜「演說學」漏印原用英文。今推測此一英文可能是 Member 覆按本誌上期拙著「民國史研究的啓示」：國父

當時翻譯林肯名言的幾經推敲終成「民有民治民享」絕句，這一「夥計」的譯名確如國父所說含有「平等」「親切」「同胞真意」。用這一稱謂「喚起民家」真太適切了。憶數年前國慶盛典，群衆歡呼「總統萬歲」，蔣總統報之以「大家萬歲」（中央日報刊載）！這「大家」二字所表現的意義真如國父應用「夥計」一樣後先輝映，深合「平等」「親切」「同胞真意」。

第二、上錄演詞國父對青年指出「無意識」「有意識」求學的二類型，並且舉日本大隈重信、井上馨兩人立志救國爲例，不僅在當時可發人猛省，對今日青年更是晨鐘暮鼓，甚至是當頭一棒。

第三、上述演詞提及「世界主義」「民族主義」云云，爲是年六月講述「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所未涉及，民國十三年一月演講民族主義才提及。這一演講不僅是國父發表有關這一見解的最早紀錄。並且時間在民國十年八月間，更具意義。因自陳獨秀於是年一月南來廣州即利用機會作共產黨之組織宣傳工作。是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組成，其政綱之一即在促使中國成爲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之一。是則國父這段話真是予以迎頭痛擊，公開駁斥。

第四、上錄演講末段提示「一次徹底解決三問題」云云，當時自是語重心長，今日重讀結語：「竊恐社會主義之橫決，一發而不可救」更不覺涕淚交並（註一）。傅斯年痛責教育界之「懶」，良有以也。

今再抄同一「演說學」所刊「政治教育」演

講。原注「在廣東全省第五次教育大會演講」。未註明年月日，臺北無當時廣州報紙可查，「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中也沒有記載。但這一演講中一再提到「十年」及建國方略云云，再覆按上述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廣州舉行時日，則廣東全省第五次教育大會集會時間應在全國聯合會之前，要爲合乎情理，且覆按上述國父行程必在民國十年十月十五日以前。同時這一演講內容與上一演講也具連貫性，其發表時日應相距不遠。下面即「政治教育」演詞內容：

孫大總統演說詞

政治教育

（在廣東全省第五次教育大會講演政治教育）

今日為行開會式，兄弟承汪先生相邀到來談話。吾人試想教育家對於今日中國建設的問題，實負有重大的力量，用得其當，則中國進步加速甚多。

在今日教育家所宜用為引導國民者，果以何為最要乎？以何者為標準乎？以世界何事為最有力量之標準乎？吾以為凡足以助世界進化改變人生觀者為最要，所當用力以赴之者，亦以此為最要。

諸君乃教育家，須知教育者乃引導人

群進化者也，然能令人羣進化最速者果何力乎？則政治的力量是也。政治是促人羣進化之唯一工具，故教育家當為政治的教育家。蓋自民國成立十年於茲，考厥成績僅能推翻滿洲政府而已，然滿洲政治之舊勢力尚未能除，故所去者祇一皇帝，而官僚武人之毒獸猶未息也。所以現今之最重要者為建設新政治，以代滿洲腐敗的舊政治。

政治的力量，足以改造人心、改造社會，為用至宏，成效至著。然每聞教育家之言曰：「以不談政治為高」。此種謬說，不知其何所據而云然？中國最大之教育家厥為孔子，我國人視孔子為聖人、為宗教家，以世界學者之眼光觀察之，則孔子為政治家，為政治教育家。試讀孔氏書，其教旨於誠意正心修身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三致意焉，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非政治教育而何？孔子且以政治為第一要務，而今之教育家輒舍政治而不談，何也？

按之吾國舊道統舊國粹，觀諸孔子所言，則不談政治固己不是；況當今日民權發達時代，人人負國民責任，人人負政治責任，而曰不談政治，尤為大謬。民國與帝國不同，帝國政治，君主一人負責任，民國政治國民均負責任。既曰國民負責矣，

而教育家乃曰不談政治，何太失自己本來之責任與人民希望之甚也。

考此種謬說之所由生，蓋亦有故：積漸亦已久。滿清專制習用愚民，及滿清既除，武人猶在，其思想習慣無異於滿清，彼方執政，壓制民權，反對共和，使人民而談政治，則彼無以肆其大慾而得其私利，乃發為一種議論，以不談政治相尚。不知此乃剽奪諸君之所有權，與諸君之本來責任相反，諸君貿然從之，亦以不談政治相尚，無乃墜其術中乎！然有許多教育家畏當道勢力而不敢違反其意，但豺狼當道，畏之不無可原，故半年前諸君不談政治，是明哲保身之一法，但今日在民治的廣東，民治的政府之下，而猶以不談政治相戒，則非政府所希望於諸君者矣。

諸君乃教育家，處先知先覺的地位，以不談政治相號召，人民更不敢談，人人都不理政治，將來更有何人負此責任？豈總統一人能負之乎？從今後，本大總統要諸君談政治！

考不談政治之謬說乃由兩種原因而生：

(一)、專制官僚成之，前已言之矣。
(二)、西洋留學生成之。有許多留學生未返中國已有學生不談政治之說，歸國後亦以為言。眩于其博士碩士之頭銜，以其

可信，於是以為微之舊官派之言，固曰不談政治，新博士之言亦云然，則皆曰不談政治，宜哉？

不知此乃以盲導盲者也！歐美留學生對於不談政治之一點，實大錯誤。實誤會之極。蓋英文Politics有三解：一解為國事，一解為黨爭，凡無聊自私之政客結黨營私，亦以政治名詞稱之。與我國所謂政治，專指國事而言者不同。故英文上政治之名詞雖一樣，然須看上下文，乃能得其正意。英文更有家庭政治之名目。所謂家庭政治者，即播弄是非之謂。故英文政治一名詞含有數意，其上者為國事，次為黨爭，下為是非。其普通習用語常曰不談政治，其意專謂不說是非耳。非真正國事亦不談也。中國留學生居其國數年，習聞其語，而不察其意，亦樂用之，歸國而不改其謬誤，可笑一至於此。國人既惑于專制官僚，再惑于留學生，誤解此種不談政治之輿論，乃入於人心，牢不可破，豈知其以盲導盲者哉！

設使諸君不談政治，學生不談政治，為農者亦不談政治，為工商者亦不談政治，試問中華民國是誰之國？而人人不負責任，尚可以為國乎？教育家應指導人民談政治，若仍以不談為高，為害匪淺。民國

十年一事不成，人人歸咎于革命黨，不知披荆斬棘，革命黨已為此至難之事；從容佈置，國民應共為之；乃國民程度低淺，稍有變革，手足無措，國民程度不足之咎，誰實尸之？教育家對此，乃不能辭其責。蓋十年來，政治教育家曾無出一言立一說以救斯民，而於不談政治之謬說，乃獨倡之，民國有今日之現象，無足怪也。苟猶持斯言而不悟，再歷十年，民國亦不得有進步！

教育進步以政治為基礎，試觀日本教育比之中國進步甚多，攷其故，則以日本政治良好。故中國今日政治尚未改良，所以無論如何提倡教育亦不為功。近日北京政治腐敗，教育乃日壞，學校經費不給，教員薪金不繼，北京教育經費區區不過數十萬元，政府新而不與，一督軍入京索費用至千萬元，而政府則慷慨予之。政治不良，教育不能發展，觀北京政治可以為證矣。所以兄弟今日到此談話，欲諸君知道中國政治之急宜改良及如何改良。對諸君一說改良中國政治頭緒紛繁，非一二小時所能說，僅將兄弟改造中國的目的約略言之：

當革命之初，吾黨有志用十年時間改造中國，使中國為世界第一，諸君以為可

達此目的乎？諸君亦有此志否？諸君如有此志，則可以為教育家！如無此志，則不如及早改業！欲使中國教育居世界第一等位置，必當使全國人民無不識字，有一百數十萬的專門學者，有一萬幾千的發明家，必如此乃可以為世界第一等教育，然教育隨政治為轉移，欲於十年內令中國教育進世界第一地位，必政治已先達世界第一地位方可，顧此事可能乎？否乎？吾必曰可能。請證明之：

攷近日新興之國究其強國之方可知也。日本五十年前其國勢不如今日中國，其人民不過如四川一省之衆，土地不過如四川一省之廣，五十年內進為世界第一等國。以中國與之較：人則十倍之，地則二十倍之，聰明才力又不亞于彼，而中國國際地位較日本何如乎？果何故也？

又試觀暹羅昔為我屬國，諸君之所知也，人口七百萬，且半屬中國子孫，地大僅如四川耳。以中國與之較又何如？然暹羅有裁判外人權，稅關獨立。回視中國稅關握之於外人，領事裁判權不能收回，外人所到之處即其領土，官吏不敢管，警察不敢詰，中國領土主權喪失已久矣。當外人初入中國，士大夫之言曰法令不行於境，中國之恥也。今國人已習而不知恥矣。中

國不能稱為獨立國，祇可稱為半獨立國！亞洲之獨立國惟日本與暹羅，雖日本強而暹羅稍弱，然暹羅國際地位已高於中國，中國在世界上以人口計則第一，以地域計則第四，而國際地位計則在三十名以下，又窮又弱，海關受制，工商業受奪，經濟日困，情勢如此，何教育之能言？所以以改造政治為第一要件。

日本初為窮弱國也，暹羅初亦最貧國也，而一則五十年，一則二十年成為強國；以中國挾如此土地人民而不能乎？今者中國國權已落于日本人之手，視我為屬國支配之宰制之，其國中教育家定有計畫處分中國，小學生則教以勤遠略。我國教育家有志謀處分日本者乎？中國有富強之資料，而不能富強，遜於日本，無他，日本重政治教育，而中國不然，此皆諸君之咎！蓋諸君提倡不談政治一語誤之也。所謂一言喪邦，此之謂歟？從今以後諸君須覺悟，一改前時積習，教育家須談政治理政治，引導人民談政治。古人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專制時事已能言之，況乃民國時代乎？中國今日貧弱極矣，喪亡可慮，蓋世界不進則退，自歐美勢力侵入中國百有餘年，中國日弱一日，今猶不進，十年以後仍是如斯，受人淘汰必矣。故今日

實為中國存亡之交，幸而滿清已倒，武人勢力可望日漸消除，有廣東一片乾淨土，為發展根基，謀改良政治，故甚望諸君提倡談政治，引導人民理政治，同心協力改造中國。

改造之方法已有預備，茲為諸君言之。余於三年前曾發行一書曰孫文學說，先改造中國人心理，昨年發行中國實業計畫一書，謀改造中國物質，與工商之業。蓋中國寶藏至富，甲于世界，開發振興，中國必強，此書為英文本，風行歐美，彼方專門學者皆許以為可行，現在廣東翻印中文本，不日可出版。

第三種計畫為改造社會，第四種為改造政治，合改造心理為物質社會政治四種一書，名曰建國方略，將來出版可以相送，協力研究之提倡之，則十年興國可望成功。

中國人有一種心理：不知之事便不肯做，必知之已真，然後為之。此種心理謂為好亦得，謂為壞亦得。何也？蓋天下事有不可知者甚多，若必深知而後行，則所成者甚寡，如教育界教人知者也，人生須受教育，由小學以至于大學至少十六年，稍懶者二十年以至三十年，使教育普及如今日俄國，人民悉由國家教育之，補助一

切費用，設人人受三十年教育，三十年已半世矣，費半世功夫求知後乃行其所知，人民程度進此，乃可言不知不行，不然，事事先問知而後行，則無一事可行。

建設國家乃無人能知之者，日本五十年成爲強國，其當時有預算計劃以爲強國之本否？無之也！建造房屋材木磚瓦可得而算，建國則不能以計算之也，不能計算即不可知。

世界文明國多矣，中國可步趨之以臻富強，然而不能者，非不知所以步趨之也，半知而不全知之故也，請彼推翻舊政治行新政治，彼必不肯，彼不知，更且不談也。

希臘先哲之言曰：人者政治動物也，有政治思想政治行爲政治能力，乃爲人類。人之所以異於他動物者，以此，故不談政治非人也，蓋人不能離國家，即不能離政治。中國人非不能建造好國家好政治，試觀歷史唐虞三代之隆，稱爲至盛，在幾千年前之祖宗，已有此種能力。近者日本五十年亦能改造好國家。遠攷吾祖宗，近徵諸日本，其所以有此能力，皆在不知之中。夫不知安能爲之，無乃誣乎。然試思唐虞三代學問知識能知之而後爲之乎？日本五十年前亦能知有今日強盛乎？可見其

進行皆在不識不知之中也，明矣。

中國人得半知不能全知，半知不敢爲，又無全知，必欲待全知，然後爲之。此中國所以停滯不進也。夫學三十年乃得全知，中國之得學者僅少數，而存不知不行之見，政治尚有改良之日耶？日本當初一時受刺激，一二志士振臂狂呼救國，全國響應人人闖目相從，故有今日強盛。暹羅一二王子提倡于上，鼓勵其國民舉從之，今亦漸盛，皆于不識不知得之，蓋建造屋可計算而知之，建國則不能預知之也。

兄弟幾十年前提倡改造中國，破壞已成功，於是欲人民建設，因多問建設方法于予，告以計畫，則必曰君之計畫可行，特知之耳。知之非難，行之爲難，卒誤於此心理，而無一成，行之爲難，一言誤中亦不淺者也。

教育家須記提倡政治，實行改良政治，使四萬萬國民同心協力改良政治，諸君當負責任！又須知國強不能預知，祇實行做去便得；若必想知清楚然後做，天下斷無此理者，譬如電燈照耀光明，人人享其利，然電學精微，人之知之者甚少，若必待人均知電學而後用電燈，可乎？政治亦猶是也？可信賴政治家做去，十年定有功效可睹，如欲知之，可讀建國方略，但無須

此一級工失。

中國今日不必人民去求知，祇望其有一種十年可強中國之信仰足矣。有強中國之志足矣。教育家宜提倡民志，則政治自易改良，政治良好，則教育不成問題矣。能達俄國今日教育情狀亦不難者，唯總要諸君教育家不忘政治！

這一「政治教育」要旨，實爲後來孫先生注意向青年學生演講的前奏。其中分析「不談政治」原因更爲前人所未發，而其對教育界人士希望殷切故責備也嚴厲：「此皆諸君之咎！蓋諸君提倡不談政治一語誤之也，所謂一言喪邦，此之謂歟？從今以後諸君須覺悟一改前時積習；教育家須談政治、理政治，引導人民談政治」。持教鞭粉筆的人聽了眞要汗顏無地自容。因此不到半年，良好反應即自北京南京產生了。

民國十一年夏，北京初創的「努力」周報刊載是年五月十三日北大校長蔡元培等十六人共同署名提議的「我們的政治主張」（胡適撰稿）。其中第四節「政治改革的唯一下手工夫」有云：

「我們深信中國所以敗壞到這步田地，雖有種種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確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好人籠着手，惡人背着走』。因此，我們深信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於好人須要有奮鬥的精神。凡是社會上的優秀份子，應該爲自衛計，爲社會國家計，出來和惡勢力奮鬥。我們應該回想：民國初元的新氣象，豈不是因爲國中優秀份子加入

政治運動的效果嗎？當時舊官僚很多跑到青島天津上海去拿出錢來做上生意，不想出來做官了。聽說那時的曹汝霖每天在家關起門來研究憲法，後來好人漸漸的厭倦政治了，跑的跑了，退隱的退隱了；於是曹汝霖丟下他的憲法書本，開門出來了。於是青島天津上海的舊官僚也就一個一個的跑回來做參政、諮議、總長、次長了。民國五六年以來，好人袖着手看着中國分裂，看着討伐西南，看着安福部成立與猖獗，看着蒙古的失掉，看着山東的賣掉，看着軍閥的橫行，看着國家破產丟臉到這步田地——够了！罪魁禍首的好人現在可以起來了！做好人是不夠的，須要做奮鬥的好人；消極的輿論是不夠的，須要有決戰的輿論，這是政治改革的第一步「下手工夫」。

這一「我們的政治主張」文末有提議人姓名職業。計蔡元培（北大校長）、王寵惠（北大教員）、羅文幹（北大教員）、湯爾和（醫學博士）、陶知行（東南大學教育科主任）、王伯秋（東南大學政治經濟科主任）、梁漱溟（北大教員）、李大釗（北大圖書館主任）、陶孟和（北大哲學系主任）、朱經農（北大教授）、張慰慈（北大教員）、高一涵（北大教員）、徐寶璜（北大教授）、王徵（美國新銀行團秘書）、丁文江（前地質調查所所長）、胡適（北大教務長）。這十六人中幾乎五分之四以上是早期留學生而在當時都是著名教育家，有此共同表示以響應孫先生的號召，而與梁啟超在其主辦的「改造」雜誌上

刊佈「政治運動之意義及價值」、張君勱在「同一雜誌發表「國民政治品格之提高」主張却有很大距離。這在當時即極具政治意義。民國十三年冬，孫先生毅然決定北上並準備在北京大學演講民生主義。這是一最好背景說明。北伐成功以後，歐美回國學人熱心從政，「九一八」國難來臨，著名學人如蔣廷黻等更多從政。「八一三」全面抗戰開始，胡適也毅然受命擔任駐美大使。脈絡分明，是則孫先生這一「政治教育」演講實具有劃時代轉移風氣的歷史價值（註二）。

「演說學」又刊載：民國十二年國父在香港大學演講「革命思想的來源」，比較百年誕辰本「國父全集」及國防研究院本「國父全集」同題內容不同而比較生動翔實。

上述兩篇佚文及另篇的異文的發現，顯示國父全集之從新做起工作已是刻不容緩。尤其英文文獻的收集更不能再忽略。聞當局有將「全集」譯為英文計劃，則收集英文文獻應該不是苛求。如篇首所陳：今日外國各種有關資料極多，只要主管當局有決心從事這一全集的重新搜集編輯工作是並不太困難的。

（註一）按是年六月國父演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有云：「民生主義就是時下的社會主義。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義是在什麼時候呢？國人到今天才出來講社會主義，已經很遲了……兄弟把社會主義的原文譯成民生主義，在意義上較為妥當……兄弟所主張的民生主義，有很好的具體辦法，不是像那些好奇的人，徒託空談，取快一時的言論……社會主義的真諦，如果專從

書本中研究，不是專靠幾十本幾百本書或者是幾千本書可以看得出來的。必要有機敏的會心、確實的心得，才可以領悟得出來。我嘗說中國人讀書越讀越糊塗，大概就是這一類的人」（國父全集第一冊壹——二一六頁）。今以之與本文所引錄的演講後段合看，國父當時對陳獨秀等所作共產組織與宣傳之指斥，真是嚴厲之至。這兩篇演講均發表於民國十年夏。也就是說早在民國十二年一月國民黨改組之前，更在民國十三年一月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前。這實在是國父採取「容共」手段以求消溶共產邪說之最早最要的文獻，值得世人特別注意。

（註二）民國卅六年六月十四日南京出版的「世紀評論」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刊載蔣廷黻撰「漫談知識份子的時代使命」中有云：「在我們這裡，如果知識份子能保存士大夫傳統的氣節，我們可能超度西洋近三百年的歷史。孫中山之所以堅持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要同時並進，就是要縮短歷史的過程」。「中國知識份子與政治的關係是切身的。事實雖是如此，知識份子却不肯充分承認。他們中間至今尚有人在作夢：一種夢是教育清高而作官不清高，另一種則以為惟獨作官是光榮。其實教學可以清高，普通也是清高，但作官也可以清高，應該清高，作官可以得光榮，也可以不得光榮。並且教書作工程師行醫當律師都是光榮的」。今按蔣廷黻先生是當代學人從政最有成績的，他教書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大師，他從政尤其在聯合國為我國家奮鬥，更贏得國人的欽敬，他實在可為現代中國青年報國的模範。